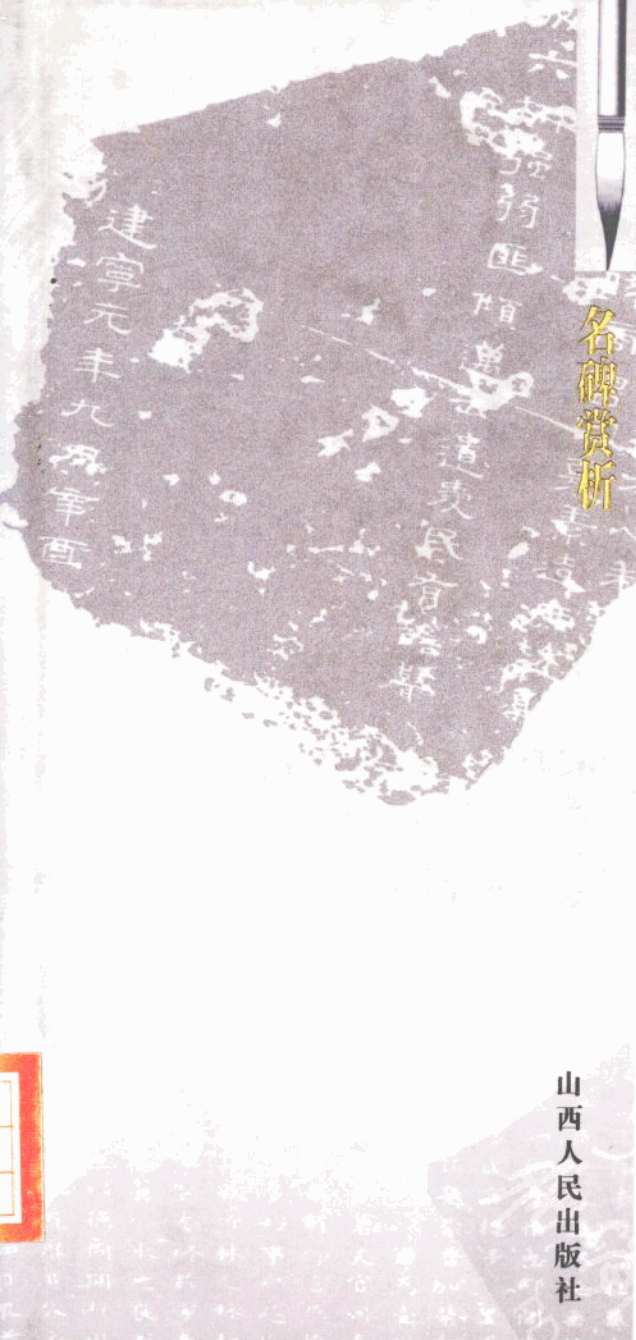


王大高 / 主編

河東百通名碑賞析

名碑賞析

山西人民出版社



序 言

●王大高

序
言

审阅完书稿的最后一页，窗外已现曙色，我却全无倦意。看着案头这部即将付梓出版的《河东百通名碑赏析》，欣慰之情油然而生。两年时间过去了，20多位同志的辛勤耕作终于有了果实。我首先想到的是应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出版这部书的动意，最初是在一次庆祝建国50周年的“河东碑刻拓本展览”时形成的。由当时的运城地区石刻研究会举办的这次展览，汇集了古河东地区一百多通名碑的拓片。以前，由于工作关系和业余爱好，我也曾鉴赏和临摹过一些碑拓，涉猎过一些石刻艺术，但置身于河东碑拓之林中的感受是前所未有的。来参观的人群无不为之河东碑刻的年代久长、种类繁多、博大精深而震撼和自豪。其中许多碑刻的内容仍给今人以启迪和教育，于是我萌发了一个念头，如果能把这些碑刻遴选并配以赏析文章，编辑成书，既可起到宣传河东石刻的内涵、价值及其现实意义的作用，又可通过它让域内乃至世界的朋友们了解河东的历史文化和人文风情；还可以起到“借古鉴今”、“古为今用”的作用，推动我国两个文明建设和公民道德

规范活动的开展。于是我约见了长期研究碑刻又主办这次展览的吴钧先生，提出了我的建议并得到了他的支持。后来，又请原运城高专校长赵北耀先生、原文化局付仁杰局长等组织了高专的一些教授及文物界的专家共 10 余名（后来发展到 20 名），开始了《河东百通名碑赏析》的编撰工作。

（一）

运城市所辖的 13 个县、市、区，古为河东属地，地处黄河中游，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历史悠久，地灵人杰。这里不仅有着丰富的人文资源，而且古代石刻的蕴藏数量，居于全省之首。清代金石学家叶昌炽在其所著《语石》中云：“大抵晋碑皆萃于蒲、绛、泽、潞四属”，其中前两者均归属今运城市管辖。清光绪十八年（1892 年），杨笃所辑《金石记》，共收录石刻目录 1536 通，其中河东为 399 通，占 38.4%；光绪二十五年（1899 年），山西巡抚胡聘之所纂《山右石刻丛编》，共辑录全省石刻碑文 720 通，其中河东为 277 通，占 32%，这些都充分表明了河东石刻在三晋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河东表里河山，燕秦接壤，豪门显族，名宦宿儒，代不乏人。昔日，望族墓地，冢墓丛集，碑石林立；庵观寺院，翠柏郁郁，碑碣密布；衙署祠庙，大小碑碣，随处可见；田野阡陌，山崖深谷，闾里神道，丰碑巨碣，俯视皆是。清代著名学者祁韵士在他的《万里行程记》中，赋有“穷碑当道忠良劝”的诗句，并注释“教泽贞节之碑，路旁甚多”。1997 年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三晋石刻总目·运城地区卷》，共收录全区碑刻目录 4226 通（方），这是 1995 年前调查登记的数字，至今

时过数年，又新发现 2000 余通；今年启动的“河东万通石刻藏拓工程”证实了河东石刻的藏量超过了万通之多。河东碑刻之多，祁韵士在其《途中偶占》诗中道出了根由：“帝墟人物数河东，陈迹千秋指顾空；故老不知三凤里，新田那忆六宗风；开皇经术文中子，西汉才名太史公；只此数贤堪不朽，云山佳气尚葱葱。”这不能不说是河东石刻之多与河东明贤之多不无关系。

河东碑刻不仅数量居三晋之冠，而且名碑荟萃，见著史册。仅《语石》一书中，引证、评述河东石刻达数十处。1979 年国家文物局公布的全国书法艺术第一批参考名碑，山西共 11 通，而河东即占其中 6 通。叶氏在《语石》中断言“自是太行以西，潼蒲以东无汉刻矣”，而自 60 年代起，在河东境内陆续出土和发现汉代石刻 5 处 9 篇。其中有垣曲县五福涧村黄河古栈道摩崖的东汉建武十一年（35 年）“遣修栈道题记”；临猗县出土的东汉建宁元年（168 年）的《建宁残石》；运城市区中条山矿洞摩崖的“光和二年”（179 年）、“中平二年”（185 年）“甲子”、“甘露”、“平阳司马胡生”题记和夏县王村汉墓出土的“安定太守裴将军碑”残石，万荣县荣河汉墓出土的“冯子翼作”砖刻题名，这些事实推翻了叶氏“山右无汉刻”的论断。石刻以时代最古者为贵，据统计全市共有北魏至隋唐碑刻 70 余通，墓志 30 余方，造像碑将近百通，这些均为石刻中的珍品，是国家之瑰宝，弥足珍贵。正如著名文物鉴定家史树青先生跋文曰：“片石残字，皆称国宝。”至于宋、金、元、明、清至民国期间的碑刻中，具有历史、科学、艺术价值的为数更多。《河东百通名碑赏析》所辑百通名碑就是从以上碑刻中经过挑选爬梳编辑而成。

(二)

《河东百通名碑赏析》中辑录的碑刻，按时代分为：东汉 1 通、北朝 2 通、隋 2 通、唐 4 通、宋 6 通、金 4 通、元 4 通、明 23 通、清 41 通、民国 10 通、时代不详者 5 通。我们把这些碑刻统统称之为“名碑”，这是因为它记载和反映了我国历史上的一些重要人物的事迹和重大事件，记录了河东人民在生产生活活动中的许多具有重要意义的典型史实，称之为“名碑”当是名副其实。

综览全书，百通名碑的内容十分广泛。它涉及到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有以政为德、励精图治、治乱兴衰、济世安民的明君贤主；有忧乐天下、忠君爱民、南征北战、出生入死的忠臣良将；有以民为本、勤于政事、廉洁自律、造福一方的清官廉吏；有重教兴文、乐输募资、隐居不仕、主坛讲学的先哲名儒；有以义为上、舍生取义、仗义赐舍、扶贫济困的义民义士。他们是国家的脊梁，民心的寄托，历史的功臣，他们为民族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青史留名，永载千秋。

百通名碑中记载了劳动人民为了生存，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战天斗地，治山治水，植树造林，在农业方面创造了物质财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箴言是历代先哲宿儒用劳动和智慧创造的精神产品，是警世名言，是晨钟暮鼓，是处世经文，它对规范人们的道德言行起到了儆示和制约的作用。乡约是由乡民自发制定的地方法规，对倡导社会文明，淳化民风，革除陋俗，维护地方安宁，起到了国家法规所不能代替的作用。诗咏是我国文学宝库中的珍贵遗产，具有文学艺术价值，它的内容

不仅歌颂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名胜古迹，人文风物，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政治风云和人们的精神境界，而且鞭笞了丑恶，揭露了黑暗，是研究我国人文、地理、风情的重要参考资料。自然灾害给历代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地震、风雹、狼鼠等灾害的惨状，令人怵目惊心。它儆示后人，痛定思痛，树立防灾、备荒观念，耕三余一，耕九余三，做到有备无患。题名是一乡一地一人的标志和荣耀，有题人名、地名、坊名等，或题于神道，或题于墓前，或题于闾里，或题于坊额、衙署，它是研究和考证历史人物生籍、生平事迹的重要佐证和参考资料。它激励着后来者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前赴后继，奋发进取，不懈努力。

百通名碑体现出了我们中华民族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渐凝聚起来的民族精神：爱国守法，忠勇尚义，勤劳俭朴，诚实守信，尊师重教，尊老爱幼，乐善好施，团结友爱，谦虚礼貌，忍让待人，律己宽人，见义勇为，自强不息，积极进取。这种精神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为人类文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毛泽东主席说过：“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珍贵的遗产。”邓小平说：“大胆吸取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江泽民指出：“中华民族是具有悠久历史和优秀文化的伟大民族。我们的文化建设不能割断历史。对民族传统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结合时代的特点加以发展，推陈出新，使它不断发扬光大。”

石刻文化是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它与其他民族文化一样，是发展我国民族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必不可少的重

要资料。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古为今用”是马列主义对待历史文化的方针。“古为今用”在我国历史上古今政治家、史学家论述颇多。东汉王充在《论衡》中说过：“知古不知今，陆沉；知今不知古，盲瞽。”司马迁评《春秋》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并标榜自己继《春秋》写《史记》意在通古今之变，申明自己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唐太宗李世民说过：“以铜为镜，可以整衣冠；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以古为镜，可以知兴衰。”史学家刘知几说：“盖史之用也，记功同过，彰盖瘴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宋司马光说：“史者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以知先，是故人主不可以不观史，善者可以为法，不善者可以为戒。”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在巴黎集会发表的宣言中提出：“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要从两千五百年前孔子那里去寻找智慧。”美国黎岳庭马克特在其《中国全球化的第一资本“道德”与“民族灵魂”工程的建设》一文中建议：21世纪的中国在全球化中急需第一资本，并要积极着手于民族灵魂工程建设，“文化和灵魂”，包括道德和传统思想等。古今中外名人的论述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传统文化包括石刻文化在内，根植于封建社会的土壤之中，受诸子百家学说和儒道释教的影响，具有鲜明的矛盾性和两重性，既有民主性的精华，又有封建性的糟粕，既有积极进步、革新的一面，又有消极、保守、落后的一面，精华与糟粕互相结合，良莠混杂，瑕瑜互见。因此对于传统文化，包括石刻文化在内，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坚持批判、继承，“弃糟取精”，既反对全盘否定的历史虚无主义，又要反对全盘继承的复古主义。我们党始终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我们石刻研究工作者要继承发展与弘扬祖国的

石刻文化，为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做出贡献。

驻笔之时，忽然想起再过两天就是春节了。这是一个古老的传统节日，但却充满着怀念与期盼，因为它是年复一年的新旧交替。碑刻也是古老的，闪烁着永不磨灭的智慧与哲理之光，赏析碑刻会感受到古与今的对话，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交汇。古人、今人和后人都会从中受益。是为序。

2002年2月10日凌晨

编 例

一、本书是根据运城市（古属河东）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50 周年而举办的“河东百通碑刻拓本展览”所展出的拓本，经过调整、筛选并进等到校点、注释和赏析编辑而成，故名《河东百通名碑赏析》。

二、本书所收百通碑刻，按石刻分类并结合碑文内容，编为十篇：珍品篇、德政篇、教育篇、义行篇、箴铭篇、农水篇、灾情篇、乡约篇、诗咏篇和题名篇。

三、本书碑题，以碑文首行碑题或额题为名，碑题文字过长者从简。无碑题或额题剥泐不可辨识者，根据碑文内容拟题，并在拟题后注以 * 号，以示区别。

四、本书为保持每通碑刻的原貌，对所有碑文均按拓本照录全文，对其中个别碑文中的施银化缘人名等从略。

五、本书对碑文的繁体、异体字，均校改为规范的简化字；对个别查找无着者，则按原字笔画照录。

六、本书对碑文中有关一些地名、人名、生僻字和词语、典故等，略作注释。

七、本书中的“赏析”部分，对每通碑刻的形制和特征，作了一些必要的说明介绍。对其内容、主要价值和意义，力求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作一些必要的分析、鉴赏和评述，以帮助读者正确理解和吸收其中的精华。

八、本书对碑文中的剥泐、佚阙和难以辨认的字，均以“□”代之，阙佚过多无法计数者，则以“阙”字代之。

九、本书对碑文中涉及到的干支纪年均换算为公元年号，注于括弧之内。

十、本书附录部分拓照，力求图文并茂，增强阅读、观赏和收藏价值。

目 录

1 序 言

1 编 例

· 珍品篇 ·

- | | |
|----------------|------------------|
| 2 建宁残碑 | 东汉建宁元年 (168 年) |
| 5 密云太守霍扬碑 | 北魏景明五年 (504 年) |
| 9 譙郡太守曹恪碑 | 北周天和五年 (570 年) |
| 15 梁州使君陈茂碑 | 隋开皇十四年 (594 年) |
| 21 栖岩寺舍利塔之碑 | 隋大业四年 (608 年) |
| 30 故益州总管司马裴镜民碑 | 唐贞观十一年 (637 年) |
| 36 碧落碑 | 唐咸亨元年 (670 年) |
| 40 玄宗御书裴光庭碑敕 | 唐开元二十四年 (736 年) |
| 47 汾阴二圣配飨铭 | 宋大中祥符四年 (1011 年) |
| 55 大观圣作之碑 | 宋大观元年 (1107 年) |
| 63 司马温公神道碑 | 元至正十二年 (1352 年) |
| 79 平淮西碑 | 清道光三十年 (1850 年) |

·德政篇·

- | | | |
|-----|-------------|------------------|
| 97 | 文臣七条戒官吏 | 宋建中靖国元年 (1101 年) |
| 100 | 虞芮二君让德记 | 金大安二年 (1210 年) |
| 106 | 姚天福神道碑 | 元至顺四年 (1333 年) |
| 134 | 张廷相去思碣铭 | 明嘉靖十三年 (1534 年) |
| 144 | 赵庭琰去思德政碑 | 明万历四十二年 (1614 年) |
| 153 | 严禁滥委佐杂断案碑 * | 清道光十九年 (1839 年) |
| 156 | 严禁传呈事告示碑 * | 清同治八年 (1869 年) |
| 160 | 强宜庵免减差徭记 | 清同治十三年 (1874 年) |
| 167 | 禁止擅受告示碑 * | 清光绪五年 (1879 年) |
| 171 | 盐使金勇德政碑 | 民国 5 年 (1916 年) |

·教育篇·

- | | | |
|-----|-----------|------------------|
| 174 | 刘公兴学劝贤记 * | 明弘治四年 (1491 年) |
| 180 | 河东书院藏书楼记 | 明正德九年 (1514 年) |
| 185 | 重修育才馆碑记 | 明万历四十六年 (1618 年) |
| 190 | 敕谕提学教条碑 | 明正德五年 (1510 年) |
| 197 | 弦歌书院记 | 清乾隆十七年 (1752 年) |
| 202 | 望仙庄设立义学碑记 | 清乾隆二十年 (1755 年) |
| 206 | 兴贤会义学碑记 | 清嘉庆十五年 (1810 年) |
| 211 | 西河书院学规记 | 清道光二十四年 (1844 年) |
| 217 | 以里书银抵公堂礼记 | 清光绪八年 (1882 年) |
| 230 | 曲郭二公捐金兴学碑 | 民国 21 年 (1932 年) |

· 义行篇 ·

- | | |
|---------------|------------------|
| 234 叔夷伯齐庙碑 | 宋元祐六年 (1091 年) |
| 238 仝氏尚义输粮记 | 明正统六年 (1441 年) |
| 242 重修扁鹊祠记 | 明万历二十八年 (1600 年) |
| 246 重修茶房记 | 清嘉庆十九年 (1814 年) |
| 248 雷素斋德行碑 | 清同治七年 (1868 年) |
| 253 矜恤贫民路毙碑 * | 清同治十一年 (1872 年) |
| 258 王寅亭墓志铭 | 清光绪十一年 (1885 年) |
| 263 创建元宗财神庙碑 | 清光绪十五年 (1889 年) |
| 267 郭宝臣德行碑 | 民国 11 年 (1922 年) |
| 271 吴绍先义行碑 | 民国 12 年 (1923 年) |
| 280 尚母李太夫人墓志铭 | 民国 22 年 (1933 年) |
| 286 李和林德行碑 | 民国 23 年 (1944 年) |

· 箴铭篇 ·

- | | |
|---------------|------------------|
| 291 布衾景仁惠尧夫铭 | 宋元祐二年 (1087 年) |
| 295 柳氏家训刻石 | 金皇统九年 (1149 年) |
| 298 御制戒石铭 | 金明昌元年 (1190 年) |
| 301 范浚心箴 | 明嘉靖七年 (1528 年) |
| 304 朱伯庐治家格言 | 清道光七年 (1827 年) |
| 308 陈文恭语刻石 | 民国 11 年 (1922 年) |
| 311 礼义廉耻四箴并序 | 民国 23 年 (1934 年) |
| 316 宋朱文公赞“四好” | 年代不详 |
| 320 吕仙养气百字碑 | 年代不详 |

- [323] 吕仙养性百字碑 年代不详

· 农 水 篇 ·

- [327] 广仁王龙泉记 唐元和三年(808年)
 [331] 绛县重导带溪水记 明弘治十三年(1500年)
 [335] 重修私渠河记 明弘治十五年(1502年)
 [339] 帝庙植柏诗有序 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
 [345] 重修周逸民猗顿氏墓记 清道光十七年(1837年)
 [351] 解店凿井记 * 清咸丰十年(1860年)
 [354] 疏浚池塘记 * 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
 [357] 南冯里护渠碑 * 民国9年(1920年)
 [360] 东社植树碑记 民国10年(1921年)
 [363] 太峰铭 年代不详

· 灾 情 篇 ·

- [366] 地震无祀鬼嵬碑 * 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
 [368] 地震碑 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
 [371] 闲事碑 清顺治五年(1648年)
 [374] 风雨雹三灾砖记 * 清嘉庆十五年(1810年)
 [377] 灾年后掩藏暴骨记 清光绪五年(1879年)
 [380] 历年遭劫记 清光绪六年(1880年)
 [383] 杜村灾情碑 清光绪九年(1883年)
 [386] 丁丑大荒记 清光绪九年(1883年)
 [390] 荒旱及瘟疫狼鼠灾伤记 清光绪十年(1884年)
 [395] 补修兴国寺塔记 民国30年(1941年)

·乡约篇·

- | | |
|-------------------|------------------|
| [399] 闾庄公立禁赌碑 * | 清雍正二年 (1724 年) |
| [402] 三社振风励俗恪守碑 * | 清乾隆二十七年 (1762 年) |
| [405] 合村公议禁止诸条碑 | 清乾隆四十一年 (1776 年) |
| [407] 千秋鉴乡约碑 | 清乾隆四十五年 (1780 年) |
| [410] 孙远村箴铭 * | 清嘉庆十九年 (1814 年) |
| [412] 蔺氏族规碑 * | 清嘉庆二十年 (1815 年) |
| [415] 公议村规碑 * | 清道光二十九年 (1849 年) |
| [417] 娘娘庙村规碑 * | 清咸丰九年 (1859 年) |
| [419] 灾年义埋饿殍碑 * | 清光绪三年 (1877 年) |
| [421] 寺北村整饬村风碑 * | 年代不详 |

·诗咏篇·

- | | |
|------------------|-------------------------------|
| [424] 居园池记 | 宋治平二年 (1065 年) |
| [426] 普救寺莺莺故居碑 | 金泰和四年 (1204 年) |
| [429] 汉武帝《秋风辞》 | 元大德十年 (1306 年) |
| 附: 清代《汉武帝秋风辞》刻文 | |
| [433] 康海四季六言诗刻 * | 明成化十一年至嘉靖十九年
(1475—1540 年) |
| [435] 谒司马光祠墓 | 嘉靖四年 (1525 年) |
| [438] 《盐池》诗 | 明嘉靖十九年 (1540 年) |
| [440] 再建普救寺浮图诗 | 明嘉靖四十三年 (1564 年) |
| [444] 文征明七言诗刻 * | 明万历二年 (1574 年) |
| [449] 题禹门诗 | 清康熙六年 (1667 年) |

[451] 谒解州关帝庙诗碑

清雍正十二年 (1734 年)

· 题名篇 ·

[455] “成汤居亳”题名碑

元至和二年 (1329 年)

[458] “傅说故里”题名碑

明万历四年 (1576 年)

[461] “动与天游”坊额刻石

明万历十年 (1582 年)

[464] “绛侯封邑”刻石

明崇祯五年 (1632 年)

[466] “中流砥柱”刻石

明崇祯九年 (1636 年)

[468] “舜帝故里”题名碑

清康熙十九年 (1680 年)

[471] “山翠飞来”门额刻石

清康熙五十五年 (1716 年)

[473] “砥柱河津”题榜刻石

清康熙五十九年 (1720 年)

[475] “关圣故宅”题名碑

清乾隆二十七年 (1762 年)

[478] “运安同善义仓”门额刻石

清光绪二十二年 (1896 年)

[480] 后 记

珍 品 篇

河东域内，名碑荟萃。珍品碑刻，享誉三晋。有出自碑刻滥觞之始，有帝王御制御书，有名家撰文书丹，有记载历史重大事件，有彰扬名吏善政勋迹，有国家文物局公布的全国书法艺术名碑等。珍品碑刻，或见于史籍志书，或载于诸家金石，有著目，有录文，有校正，有题跋，有评论。珍品碑刻，具有史料价值，可考史证经，纠史之误，补史之缺。珍品碑刻多为文学巨匠撰文，文字古雅练达，措辞精辟深邃。诵读其文，可以从了解到鲜为人知的历史知识及人物故事，还可以品尝到古典文学宝库中的名言佳句、警世妙语。珍品碑刻的书法多出自书坛巨擘之手，既是研究我国文学源流、书体演变的实物资料，又是书学者习书临摹的范本。珍品碑刻，年代久远，历经沧桑，存世稀有，得之不易，弥足珍贵。